

# 论《纽约时报》对晚清中国形象的建构

阳海燕

(长沙学院 图书馆,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要:**《纽约时报》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全面呈现了晚清中国社会的情况,并为读者建构了一个“落后”、“觉醒”的晚清中国形象。“落后”中国体现在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军事衰败和文化落后等方面;“觉醒”中国体现历史悠久及现代化改革方面取得初步进展等方面。《纽约时报》的晚清中国形象建构信守了新闻真实性原则,坚持客观公正的报道立场,充满理性、人道的新闻精神,深刻影响了西方主流社会“中国观”的形成。

**关键词:**《纽约时报》;晚清;对华报道;中国形象;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1)05-0070-06

## On Construction of China Image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New York Times

YANG Haiyan

(Library, Changsha College,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The New York Times has begun its reports on China from the middle and later 19th century, which presented a panorama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its later Qing dynasty, giving the readers an image of a “backward” but “awaken” China at that time. “Backward” is for its corrupted political system, ruined economy, decayed military capacity, and lagging culture; “awaken” is for its long history and primary progress in the modernization reforms. To construct the China image in its later Qing dynasty, the New York Time has obeyed the factuality principal, kept a neuter and just point of view, fulfilled the reports by reason and humanity, and thus deeply influenced the forming of the “conception of China” in occidental main society.

**Key words:** The New York Times; Late Qing ;reports on China; image of China;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国家形象包括国内形象和国际形象,国内形象是指自我评价的形象,国际形象则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是国际社会对一国相对稳定的总体评价和解读,是外部公众作为认识主体感受国家客体而形成的复合体。<sup>[1]13</sup>它作为一种主观映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信息流动中形塑出来的。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在建构国家形象,提高其在世界舞台的“能见度”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建构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媒体在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的大小。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851年由雷蒙德创刊于纽约,原名《纽约每日时报》,1857年改用现名。1896年由奥克斯接办,以“刊载一切适宜的新闻”为办刊宗旨,雄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在西方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19世纪中后期,《纽约时报》即开始了对中国跨越世纪的追踪报道。这份年轻的报纸,以一种少有的热情和冲动,全面呈现了晚清中国的方方面面,撩起了神秘中国的面纱,为西方读者建构了一个晚清中国的形象,主导了美国主流社会“中国观”的形成。本

收稿日期:2011-06-2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860053)

作者简介:阳海燕(1972-),女,湖南冷水江市人,长沙学院副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传播学研究。

文试图以郑曦原根据纽约时报馆藏的原始报道编写的《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一书,来探讨《纽约时报》所建构的晚清中国形象的内涵及其手法。

### 一 《纽约时报》所建构的晚清中国形象内涵

自鸦片战争后,古老中国被迫进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体系,按照西方现代性的面貌来“形塑”自己。在中国开始睁眼看世界的同时,世界已经开始“围观中国”,西方传媒开始了对华报道。“看与被看,”这是近代以来中西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被看”是被动的,“看”是主动的,“看”与“被看”之间隐藏着深刻的权力关系,《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就是这样一部“看与被看”的编年史。它以新闻之眼观察中国,为西方读者建构了一个“保守的大清国正在觉醒”的晚清中国形象。<sup>[2]67</sup>历史走到了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从被看的位置走到当年那些观看者的位置,看一看他们眼中的中国。

#### (一)保守的中国

《纽约时报》以西方的普世价值标准来衡量中国,在他们看来,西方的文明尺度,不仅具有空间意义,更具有时间意义,与东方国家相比,是一种处于更高历史位阶的文明形态,是东方国家历史前进的目标。在这样的新闻视域之下,晚清时期的中国落后、愚昧、保守,这种衰败是全局性的,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病入膏肓的政治腐败、深入骨髓的野蛮习性和无可救药的愚昧无知正在怎样地让这个腐烂之中的巨兽摇摇欲坠。”<sup>[2]109</sup>

1. 政治腐败。在《纽约时报》有关中国的报道中,晚清吏治腐败是重要主题。1895年3月11日,在一篇名为《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的述评中,《纽约时报》指出,晚清中国是一个“受贿者兼掠夺者的国度”,官员俸禄很低,在任上总是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军官也虚报兵额或贪污公款以增加收入,采购军火和设备也为中国官员提供了大量侵吞公款的机会。<sup>[2]110</sup>在一篇沿中国长江的游记特写中,记者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观察到“扬子江上每个航段的地方政府都有权对过往商品课税,而每个航段内又有小官吏和胥卒设置的关卡要强行收费。这些税被公认是‘敲竹杠’,那些关口被称为‘竹杠关’。”<sup>[2]145</sup>因此,《纽约时报》指出:妨碍清国进步的

主要障碍“是现行官僚阶级的无能和腐败。只要目前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继续存在下去,大清国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而持久的社会进步。”<sup>[2]75</sup>

2. 经济凋敝。晚清时期,康乾盛世已是昨日黄花。对外,因在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历次战争中,屡战屡败,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要承担巨额赔款;对内,因镇压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国库空虚,再加上落后的财税征稽制度,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纽约时报》将笔触伸向中国社会的底层,观察到了这种凋敝的经济状况在普通百姓生活上的投影,百姓工价之低世所罕见。在沿中国长江的游记特写中,两岸虽然风光美丽,但武昌、汉口和汉阳这些地方惨遭太平天国之乱,非常凄凉、凋敝。<sup>[2]45</sup>一位美国工程师在粤汉铁路沿线的观察笔记中也指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确实很低,处于一种非常简单而朴素的形态。“人们的生活不过是一种求生的挣扎。”<sup>[2]71</sup>

3. 军事窳败。晚清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兵连祸结,战火连天,战争报道是《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名为《大清帝国军事资源透析》的新闻报道中,作者指出,大清帝国的军事非常原始、落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军事力量像大清国这样脆弱”。虽兵源充足,但这些兵源无法改造成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虽购买了一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这些士兵手里也难以发挥作用。清国士兵的“装备极差,而且几乎全军都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容严整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抗不了五分钟。此外,清国军队军纪恶劣,他们的兵丁通常是社会上一些举止粗野和品行不端的人渣,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恐惧万分。”<sup>[2]32-33</sup>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纽约时报》详细地报道了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国败于蕞尔岛国日本,充分展现了晚清中国军事的落后与无能。

4. 文化落后。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停滞保守、愚昧迷信,成为《纽约时报》新闻报道的最主要内容。

(1)迷信。《纽约时报》刊载了许多西方人的在华游记,这些游记的作者深入中国社会,对晚清中国进行了近距离观察,发现中国人“迷信和偶像崇拜非常明显。手里抓着金元宝的财神爷及其他一

些据认为对挣钱有帮助的神灵们,都有各自的神像和祭台,祈福的人可以对着他们焚香膜拜。”“寺庙的僧侣没有半点敬神的样子,接受礼拜者的馈赠的礼物,兜售护身符之类的东西,更像个宽敞的贸易中心,而不是一处表达人们虔诚信仰的圣地。”<sup>[2]201</sup>

中国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与西方科学精神发生了激烈碰撞,成为中国实现现代转型的巨大障碍。在《纽约时报》看来,世界上最迷信的中国人无法理解电报的工作原理,认为一定有鬼神在其中传递信息,并将电报线附近发生的祸事与这个邪神联系起来,并群起而攻之。1876年,中国境内出现了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但这条铁路与中国人的迷信思想发生了冲突。中国人将茅屋失火归咎于铁路,责怪电缆打扰了安葬在地下祖先的安息,将此作为让它迁走的理由。后这条铁路被清政府赎回拆除。因此,在中国修筑铁路,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于“清国人民对所有外国人所抱持的敌意,以及他们自己的迷信思想。他们非常担心类似这样的大兴土木会破坏国家的风水,因而影响到农业的风调雨顺,带来洪涝灾害,甚至会让太阳发怒,烤焦他们的庄稼。”<sup>[2]61</sup>

(2) 自闭。中国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了“清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在《纽约时报》看来,中国人文化保守的形成,与中国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清国人这种考试制度的宗旨无疑是好的,但它有着非常严重的缺陷。可想而知,一种沿用了上千年之久的制度,无论起初多么完美或符合时代要求,此刻它也绝不可能再适用于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新时代了……把人的知识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的身上,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这种一成不变的教育制度,导致其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的思想在孔夫子那个时代就已经停滞下来,“从那以后,华人就一直在不断咀嚼着那几块干骨头,并且,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识的小舟敢于向他们靠近的话,他们就会咆哮不止。”<sup>[2]93</sup>

最后,《纽约时报》痛心地发现:“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像力。他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

进程中,他们是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实在不应该是这样的啊!”<sup>[2]104</sup>

(3) 野蛮。西方人通过自己的在华游历,观察到中国的制度有非常野蛮的一面。在法庭上,罪犯在官员面前必须下跪,手脚都戴着镣铐,如果拒绝回答法官提出的问题,会遭到衙役掌嘴乃至种种酷刑。犯人在监狱中会受到非人待遇,牢房拥挤,戴着木枷,食物很少,很多犯人活活饿死。法官断案,并不重视证据与严密的逻辑推理,“对清国人而言,他们哪里知道证词在西方宗教和法律体系中的神圣与庄严。”<sup>[2]77</sup>死刑犯会遭到砍头,在刑场上,砍头会有许多人围观,“人的生命被看得一钱不值。”<sup>[2]15</sup>在战争中,清朝军队会杀掉战俘以祭奠牺牲将士的亡灵,会强迫妇女缠足。在西方人看来,这些都是野蛮的恶习,令人难以接受的。

(4) 吸毒。鸦片战争之后,吸食鸦片泛滥成灾,非法的鸦片交易遍布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男人们在烟馆里吞云吐雾,看上去相当齷齪,“邪恶和令人厌恶的表情”,“兽穴一般的屋子”。吸毒的男人“一个个瘦骨嶙峋,两眼深陷,如同木乃伊一般。”<sup>[2]79</sup>

此外,《纽约时报》还报道了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最高的组织单元,“极为缺乏民族自豪感和慷慨赴死的爱国主义精神”;“遇事缺乏严谨而认真的态度”,有一种造假的本能;<sup>[2]54-55</sup>不讲卫生,城市建设差,街道狭窄肮脏,弥漫着恶臭,给人以窒息的感觉。移民到了美国,还是依然不讲卫生。这些民族劣根性在《纽约时报》上都得到了呈现。

## (二) 觉醒的中国

晚清时期,为了舒缓与回应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与压力,晚清政府开始逐步改良,面向西方,采纳其文明成果,试图强化政府的统治能力,以延续其帝制统治。晚清中国的现代性进展为《纽约时报》所关注,在其报道中“形塑”了一个“前进中国”的形象。这个沉睡了多年的辽阔国度将会在西方的冲击下醒来,并从中学会发展和进步的法则。“大清国当然有未来,而且充满希望的未来,这毋庸置疑。大清国正像由各个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世界大家庭

中每一个新成员那样有着一个光明的未来。”<sup>[2]21</sup>

1. 中国有着悠久历史与成为强国的天然基础。西方人自踏上中国的国土开始,就为这个充满东方魅力的国家所惊叹。这里国土广袤,历史悠久,风光美丽,人民勤劳,“清国人民具备一种经商的天赋以及学习和了解新生事物的渴望。”<sup>[2]71</sup>中国人“显得恭谨有礼,宽宏大量。在这点上,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要可取得多。我多么希望欧洲大城市的劳动者们也能经常光顾茶馆,而不是天天到酒吧里去闹事。”<sup>[2]32</sup>简言之,在《纽约时报》看来,古老中国在构成综合国力的所有要素上都是强有力的,具备了成为强国的天然基础。“假如我们这个世界允许她按自身的方式发展的话,那么在其努力下,大清国肯定会拥有一个令人瞩目的未来。”<sup>[2]85</sup>

2. 中国出现了一批初步熟悉和了解西方的精英阶层。《纽约时报》认为,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出现了新的历史取向,有可能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成功地改革旧体制,沿着现代化道路前进,成为自己民族的主人。《纽约时报》注意到,在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连光绪皇帝都开始学习英语,意识到与西方接触的重要性。<sup>[2]134</sup>同时,在官僚队伍中出现了一批开明的洋务官员,他们在大清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洋务派是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他们相信大清国显而易见的命运就是,向世界学习一切和艺术、科学、制造业有关的事情。”<sup>[2]54</sup>《纽约时报》对李鸿章评价很高,认为他虽然沾染了传统官场的恶习,但有比其他人更为宽广的视野,并远远地走到了这个时代的前列。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纽约时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李鸿章被描述成慈祥和蔼、机智幽默和具有现代精神的政治家。1908年,《纽约时报》还专访了袁世凯,这是他首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在谈到中国该如何进行改革时,袁世凯指出,他将继续推进改革,改革将在“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和“法律结构”等三个主要领域进行。<sup>[2]142-143</sup>在一篇关于后慈禧时代政局的分析中,作者指出,袁世凯是位杰出的“务实型”改革家,在后慈禧时代将发挥关键作用。<sup>[2]328</sup>此外,《纽约时报》还详细报道了晚清政坛的其他人物,诸如唐绍仪、伍廷芳、梁敦彦、梁诚、梁如浩、詹天佑等一批留美学子,他们在归国后,成为推动中国改革的中坚人物。

3. 中国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一批初步的改革成果。《纽约时报》在对华持续报道中,详细地展现了晚清中国在现代化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认为“东方世界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政治上,晚清政府开始整顿吏治,尝试建立现代宪政制度;在经济上,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开始建设铁路和电报线路;在外交上,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建成外交部,按照国际法则处理外交事务,派出驻外使节,保护海外华工的权益;在法制建设上,改良法律,出庭者没有座位,但不用下跪了;在文化上,兴办新式学堂,建立现代教育制度,鼓励留学,开放报禁,中文报纸的发行量稳步上升。这“显示出了清国人的进取精神,他们准备从外国人那里获取到科学的萌芽,并把它传播到社会和民众中去。”<sup>[2]27</sup>在社会上,颁布禁烟令和禁止缠足令,推动社会改良。简言之,“新式的教育方法已被引进,司法审判也变得较为仁慈,鸦片这个摧毁人身心的大敌也受到了抵制,所有这些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以作为大清国未来进步的基础。”<sup>[2]321</sup>中国正在逐步走向“觉醒”。

《纽约时报》中关于中国的报道,详细地描述了现代化运动在中国逐步展开与深入的过程,这个“前进中国”的形象说明:“清国人可能在起初的阶段,他们对革新的观念接受起来很缓慢,但是一经接受,他们对新法的支持将会非常坚定。”<sup>[2]73</sup>

## 二 《纽约时报》建构晚清中国形象的基本理念

如上所述,《纽约时报》中关于中国的报道,为西方读者建构了一个“落后”而又“前进”的晚清中国形象,那么,这一形象是按照怎样的理念塑造出来的呢?“媒体塑造国家形象的理念是指一国媒体塑造本国形象和他国形象的哲学轴心——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换句话说,是媒体(行为主体)在构建和传播国家形象(行为客体)时的基本看法和价值取向。”<sup>[1]29</sup>《纽约时报》的晚清中国形象建构,是来自他国媒体和他人意志的建构,是塑造国家形象的“他塑法”。<sup>[3]</sup>其建构理念受制于本国利益关系和意识形态架构。因此,在《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中,有着西方白种人的文明优越感及由此而来的种族偏见,如把中国人称之为“异教徒”,谑称为“天朝国民”,把中国女人走路形容为

“只用两条后腿行走的山羊”;同时作为一家美国报纸,美国利益也左右着《纽约时报》的报道立场,如在对八国联军侵华事件的报道中,将起因归结为清军虐待西方战俘,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些战俘的受辱经过,为火烧圆明园寻找合法性证据。但《纽约时报》作为一家严肃报纸,在其对华报道中基本遵循的是新闻价值观,这体现在如下方面:

### (一)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

真实是新闻的最高原则。《纽约时报》关于中国的报道被誉为“晚清历史的一部初稿”,<sup>[4]</sup>这说明《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信守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正如《纽约时报》自己所说:“报纸应杜绝那种在传播业中甚嚣尘上的刊发小道消息的现象,而以极低廉的价格给普通大众提供既有价值又值得信赖的消息,这是它具有的最令人珍视的品质。”<sup>[3]</sup>《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直观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面貌,真实描述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传统中国文化面对西方文明冲击的情形,为我们认识晚清中国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纽约时报》新闻对华报道的真实性,体现在新闻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因而使新闻真实可信。在新闻专稿《广州的一天》中,作者仔细地描述了广州的菜市场、烟馆、茶馆、尼姑庵、寺庙、店铺和各种手工作坊,深入到社会底层,触摸到了中国社会的脉搏;看到了尼姑的“懒散无聊”,寺庙僧侣长指甲里满是淤泥,“没有半点敬神的样子”,使新闻稿显得有血有肉。又如1860年10月9日,《纽约时报》刊出名为《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郊,圆明园惨遭洗劫》的报道,详细地记录了当时英法联军,特别是英军的进军情况和对圆明园的洗劫:“有的被带走,有的体积太大无法搬走就把它们砸毁掉。还有装饰用的墙格、屏风、玉饰、瓷器、钟表、窗帘和家具,没有哪件东西能逃过劫难”;“一群法国人拿着棍子又到各个房间去搜寻了一遍,打碎了剩下的每一样东西。”<sup>[2]178</sup>新闻的现场感扑面而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无可取代的历史见证。

《纽约时报》关于中国报道的真实性,我们可以从本国的历史发展中得到验证。《纽约时报》所建构的“落后”中国形象,也是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的基本内容,余音至今不绝;而“前进”中国形象,则在文革之后,中

国重启现代化改革,原来被“阶级斗争史观”所遮蔽的晚清史得到了重新书写,晚清成为中国现代性的源头。

### (二)客观公正的报道立场

美国著名新闻史家埃默里父子在其名著《美国新闻史》中说道:《纽约时报》“培养了在公共事务报道方面的一种相当正派的态度”;“在笔调上,甚至在内容上都一贯保持公正,在发展仔细认认真真的报道技巧方面也无人能及。”<sup>[5]</sup>关于中国的报道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既报道中国落后愚昧的地方,也报道中国在因应西方挑战中所取得的现代化成就,介绍康有为的改良和孙中山的革命。价值中立的新闻眼光保证了新闻的客观性。

二是在报道西方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中,不是以意识形态划线,能坚持公正立场。在关于鸦片战争的新闻报道中,《纽约时报》在1863年4月26日的述评中,指斥罪恶的鸦片贸易是英国人对中国“无耻的勒索和欺诈”,是列强有史以来带给中国最重的灾祸;“吸食鸦片对基督教的发展来说害处最大。对施加给这些正遭受毁灭的异教徒的谴责,基督徒应该感到羞愧。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个以往一直对别国有所帮助的民族,现在正在把罪恶强加于一个有着3.6亿人口的帝国身上,根本不顾这个帝国的人民是否担当得起如此的灾难,而这个制造罪恶的民族并未受到任何谴责,直到她历史上耻辱的这一页终被人们好心地遗忘。”<sup>[2]347</sup>而在关于八国联军侵华的报道中,抨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强盗式的抢劫;揭露在美契约华工的悲惨境遇,认为这是“给我们生活所在的文明时代如此丢脸的行为。”

### (三)理性、人道的新闻精神

理性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也是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核心。《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国新闻时,坚持以理性的眼光来观察和了解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纽约时报》刊发评论指出:维新人士敢于独立思考,意识到中国必须进行改革以融入世界潮流,如此,中国才有出路,但维新派存在一个巨大缺陷,就是忽视了人民的改革力量。“他们既不准接受人民所能发挥的这种作用,又不准备发动人民,让人民知道他们的奋斗与牺牲,是为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着想,因而应该受到人民的支持和尊重。”<sup>[2]316</sup>

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在分析鸦片贸易时,《纽约时报》从经济的角度指出,罪恶的鸦片贸易不但摧毁了中国经济,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而且更抑制了中国对其他商品的进口,使所有希望与中国进行正常贸易的国家蒙受了经济损失。这样的理性分析,在《纽约时报》的对华报道中比比皆是,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百多年前人类的理性和正义。”<sup>[6]</sup>

“年轻的报纸,年轻的国家,刚摆脱南北战争的阴影,还保持着几分‘五月花号’带到新大陆的清新,对人类关爱之心也远比今天纯洁。”<sup>[2]1</sup>正因这种关切人类共同命运的人道精神,《纽约时报》对中国在近代以来的悲惨遭遇寄予深切同情,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批评中国传统中落后、野蛮的文化因素,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在人道精神的烛照之下,中国不再是陌生的异国,而是与这个世界休戚相关,其新闻报道方能直抵人心,显示出温暖的色彩。

《纽约时报》关于中国的报道,坚持“两面理”的平衡报道方式,全面审视了晚清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层面,为西方建构了一个“保守”而又“前进”的中国形象。这个形象,因立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之上,较少“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的考量,因而比较真实地呈现出了晚清中国的现实,赢得了读者的信任,主导了西方主流社会“中国观”的形成。

诚然,每个国家都能控制国内的媒介以塑造自己需要的国家形象,但要影响本国的国际形象,则需要在全球树立媒介优势。传媒作为价值符号的载体,在全球化语境下猝然相遇,实际上是一场“符号战争”。传媒能够树立公信力,其所负载的价值符号能得到读者信赖,说明它在这场“符号战争”中树立了优势,赢得了文化领导权。只有经由这样的路径,国家形象的建构才能获得强大的支撑。在《纽约时报》创刊之前,美国政党报刊造谣诽谤、谩骂攻讦,造成新闻可信度差;而黄色报刊因过于追求商业利益,造成传媒职业道德滑坡。面对这两个极端,《纽约时报》则“在新闻上力求报道客观,在社

论上尽量议论持平”,<sup>[7]</sup>坚持新闻规律。在其对华报道中,人权、民主、自由等基本价值成为建构晚清中国形象的基本价值标准,由此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中国传媒走上世界,不在于其技术落后与资本弱小,根本原因就在于新闻观念的落差,在孤芳自赏中自说自话。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李对中西传媒做了如是对比:“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爱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一份伟大的报纸必是文明精神的一种体现,而我们的报纸还承担不起这份重任。”<sup>[2]297</sup>

形象建构是在信息的流动中形成的,国家形象这个“高层政治”必须落实到新闻规律这个“低层政治”来实现。在对新闻信息进行“编码”与“解码”的过程中,必须有着基于人类共同属性和共同追求的新闻价值观。一份对新闻价值是“负向认同”或者“零向认同”,不能融于世界文明的报纸,在信息传播中只能被边缘化,而成为“被看的对象”。

#### 参考文献:

- [1] 张桂珍. 中国对外传播[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 [2] 郑曦原.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 [3] 刘小燕. 关于传媒塑造国家形象的思考[J]. 国际新闻界,2002(2).
- [4] 刘学洙. 读《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J]. 《贵阳文史》,2006(1).
- [5] [美]埃默里,等. 美国新闻史[M]. 展江,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128.
- [6] 杜学文. 百年视点:介绍《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J]. 新闻出版交流,2003(4).
- [7] 李彬. 全球新闻传播史[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174.

责任编辑:骆晓会